



論古文辭學派如何接受明代後七子的文論

メタデータ	言語: eng 出版者: 公開日: 2015-03-27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顧, 春芳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doi.org/10.24729/00004331

論古文辭學派如何接受明代後七子的文論

顧春芳

以李攀龍（1514—1570年）與王世貞（1526—1590年）為首的明代後七子的文論倡導復古，他們的所謂復古就是作文學先秦、兩漢，作詩則學盛唐，他們的文章作風重視“辭與事”，其主要目的就是反對宋學，因為宋儒之學的文章作風重“理”而輕“辭”。在一百多年以後，日本的江戶時代，也出現了一股復古的文學潮流，而它就是以李攀龍與王世貞的復古文論為其主導思想。荻生徂徠（1666—1728年）領導了這股潮流，他倡導復古，並創建了古文辭學派。在不同的國度，又相隔了一個世紀之久，為何會出現如此相似的文學現象，這就不能不引人深思，本文擬將兩者復古文論的核心部分重視“辭與事”產生時的周邊文學環境作比較，揭示其中的內在聯繫。同時也可以進一步探明李、王的復古文學思想對江戶時期漢文學的發展究竟起了什麼樣的作用。

一

在這一章裡我們先來看一看李攀龍、王世貞提倡復古文學思想時的背景。王世貞的《藝苑卮言》中有這樣一段話：

李獻吉勸人勿讀唐以後文，吾始甚狹之，今乃信其然耳。記聞既雜，下筆之際，自然於筆端攪擾，驅斥為難。若模擬一篇，則易於驅斥，又覺局促，痕跡宛露，非斲輪手。自今而後，擬以純灰三斛，細滌其腸，日取六經周禮孟子老莊列荀國語左傳戰國策韓非子離騷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班氏漢書，西京以還至六朝及韓柳，便須銓擇佳者，熟讀涵泳之，令其漸漬汪洋。遇有操觚，一師心匠，氣從意暢，神與境合，分途策馭，默受指揮，臺閣山林，絕跡大漠，豈不快哉！世亦有知是古非今者，然使招之而後來，麾之而後卻，已落第二義矣。¹

文中的李獻吉即明代前七子的代表李夢陽（1472—1529年），在這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王世貞所推崇的是“六經周禮孟子老莊列荀國語左傳戰國策韓非子離騷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班氏漢書”，即先秦、兩漢的文章。至於“西京以還至六朝及韓柳”，他就要有所選擇了，至於以何標準取捨，將在下文詳細展開論述。

李夢陽作為明代前七子的代表，其反對宋學的立場也是很堅定的，他曾說過“宋無詩”，還說過“宋儒興而古之文廢矣”²，全面否定了宋代詩文。作為後七子的代表李攀

¹ 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一，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中冊，中華書局，1983年。

² 李夢陽《空同集》卷六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龍、王世貞在這一點上與前七子可以說是比較一致的。李、王二人有諸多關於批評唐以後文的論述，如王世貞有“西京之文實，東京之文弱，猶未離實也。六朝之文浮，離實也。唐之文庸，猶未離浮也。宋之文陋，離浮矣，愈下矣。元無文”³。又有“韓柳者振唐者也，其文實。歐蘇氏振宋者也，其文虛。臨川氏法而狹。南豐氏飭而衍”⁴。還有“文至於隋唐而靡極矣。韓柳振之曰，斂華而實也。至於五代而冗極矣，歐蘇振之曰，化腐而新也。然歐蘇則有間焉，其流也使人畏難而好易”⁵。從這些評論中可見王世貞對宋代的詩文是非常排斥的，究其原因，其實也是為了反對宋儒的理學。所以王世貞在談到兩漢、六朝以及唐、宋、元各代文章之特點時就指出，與前代相比，“宋之文陋，離浮矣，愈下矣”，明確地表明了他對宋文的看法。在談及宋文時多次提到歐蘇，認為“其流也使人畏難而好易”，指出了歐蘇文章作風對後世文學發展所起的不良影響。

王世貞為何會如此排斥宋人詩文，這與當時在文壇產生相當影響的明代唐宋派的代表文人王慎中與唐順之不無關係。王慎中與唐順之繼李夢陽、何景明等前七子後突進文壇，開始是傾慕李、何諸子的復古，崇尚秦漢，到後來就轉向宗宋，尤其推崇歐曾的文章，看起來同是復古，但是有著本質上的區別。王、唐的這種文章作風實際上是在復興宋儒之學，可以說是公然與反宋學的李、何諸子抗衡，這就使李、王不得不為之擔憂。李攀龍的《送王元美序》中有這樣一段話：

今之文章，如魯江、毘陵二三君子，豈不亦家傳戶誦？而持論太過，動傷氣格，憚於修辭，理勝相掩，彼豈以左丘明所載為皆侏離之語，而司馬遷敘事不近人情乎？故同一意一事而結撰迥殊者，才有所至不至也。後生學士，乃唯耳目是寄，至不能自發一識，浮沉藝苑，真為相舍，遂令古之作者謂千載無知己。……世之儒者，苟治牘成一說，不憚儂俗，比之俚言，而布在方策者耳。復以易曉忘其鄙倍，取合流俗，相沿竊譽，不自知其非。及見能為左氏、司馬文者，則又猥以不便於時制，徒蔽精神，何乃有此不可讀之語，且安所用之？⁶

在這裡李攀龍為何會如此抨擊同時代的王慎中、唐順之的文章作風，是看到了王、唐的文章作法來自宋文，其中所說的“憚於修辭，理勝相掩”就是宋儒之學的特點，即重“理”而輕“辭”。而在當時王、唐的文章已是“家傳戶誦”，如此發展下去，王、唐的這種文章作風勢必會影響整個文壇，李攀龍不能不為此而奮起反擊。李攀龍曾說過“秦漢以後無文矣”⁷，而他作文時也以先秦兩漢的文章為範本。王世貞就評他的文章作法是“無一語作漢之後，亦無一字不出漢以前”⁸；又說他的文章作法“多自左丘、子長、《韓非》、

³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三，《歷代詩話續編》中冊。

⁴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三，《歷代詩話續編》中冊。

⁵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三，《歷代詩話續編》中冊。

⁶李攀龍《滄溟先生集》，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⁷李攀龍《滄溟先生集》，卷二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⁸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三，《歷代詩話續編》中冊。

《呂覽》”⁹。李攀龍在文中極力標榜《左傳》、《史記》這樣的先秦至漢代的古文，就是強調“辭”與“事”的重要性，此處的“辭”即為修辭，“事”即為敘事，這也是針對王、唐的文章作風偏重於言理，“憚於修辭”而言的。這就是李攀龍、王世貞強調作文要重視“辭與事”的重要原因，而這也是先秦、兩漢古文的特點之一。

王世貞在《藝苑卮言》中就這樣說道：

吾嘗論孟荀以前作者，理苞塞不喻，假而達之辭；後之為文者，辭不勝，跳而匿諸理。六經也，四子也，理而辭者也。兩漢也，事而辭者也，錯以理而已。六朝也，辭而辭者也，錯以事而已。¹⁰

其中的“理苞塞不喻，假而達之辭”是說辭並不妨礙理，相反還能起到達理的作用。而“辭不勝，跳而匿諸理”則與李攀龍所指出的“憚於修辭，理勝相掩”相似，表現了他對重“理”而輕“辭”及以“理”掩“辭”的文章作風的強烈不滿。

李攀龍、王世貞把王、唐文章作風的重“理”輕“辭”都歸結於二人學習宋文，尤其是二人所推崇的歐曾。為此對歐曾的文章作風也作了嚴厲的批評，王世貞在《書曾子固文後》中這樣寫道：

子固有識有學，尤近道理，其辭亦多宏闊道美，而不免為道理所束，間有暗塞而不暢者，牽纏而不了者。要之為朱氏之濫觴也。朱氏以其近道理而許之。近代王慎中輩，其才力本勝子固，乃掇拾其所短而舍其所長，其暗塞牽纏殆又甚者，此何意也？¹¹

在這裡王世貞說宋人曾鞏的文章作風是因為“尤近道理”，“而不免為道理所束”，所以文章才會暗塞不暢，牽纏不了，並指出這就是朱子理學的濫觴。而王慎中之流，則是學了曾鞏的為文，文章的“暗塞牽纏”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對於歐陽修，儘管王世貞也在某種程度上肯定他所作的記序碑志，但對他的其他文章還是持否定態度，尤其是歐所作的《新五代史》，當時《新五代史》的文辭頗為世人所喜愛，有人還將它與《史記》、《漢書》相提並論。對此王世貞是這樣說的：

……文辭尤索寞，腴不如范曄，雅不如陳壽，比之兩晉六朝差有法耳，尚不能如其平生之所撰碑志，而何以齒《史》、《漢》哉？一安重誨傳少欲間以議論，而痕跡宛然，辭旨沓拖，去伯夷、屈平霄壤矣。¹²

王世貞在這裡明確的指出此書的弊病，即“文辭尤索寞”，它不但無法與《史記》、《漢

⁹ 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十九。

¹⁰ 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一，《歷代詩話續編》中冊。

¹¹ 王世貞《讀書後》卷三。

¹² 王世貞《讀書後》卷三。

書》相比，而且還在范曄的《後漢書》與陳壽的《三國志》之下，同時也不及歐陽修本人所作的碑志。一方面表明他對歐陽文章的態度，另一方面也怕世人不能認識到其中的危害，而誤入歧途。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見，李攀龍、王世貞所提倡的復古是尚先秦、兩漢的文章，從王世貞對各代文章的評論“文至於隋唐而靡極矣。韓柳振之曰，斂華而實也”，可見他們對韓柳的文章也是肯定的。而以李、王為代表的後七子對宋文則持否定的態度，這與當時王慎中、唐順之的宗宋不無關係，王、唐二人的文章學習宋文，尤其推崇歐曾。王、唐的文章作法重“理”而輕“辭”，傳承的實為宋儒之學。鑑於當時王、唐的文章作風已在文壇形成蔓延之勢，李、王為之奮起反擊，進而追究王、唐文章作風的根源，乃是宋儒理學的浸淫所至。為了矯革這股為宋儒理學張本的文章作風，李、王批判宋文，指出其弊害，同時以《左傳》、《史記》等先秦漢代古文代表作為作文之典範，強調“修辭”的重要性。

二

在這一章裡我們來看看古文辭學派形成時的背景，以及荻生徂徠是如何接受明代後七子的文論的。

荻生徂徠提倡古文辭時，文壇上居然也是以朱子學派為主的宋儒理學佔主導地位，可以說與李、王提倡復古時的周邊環境是極其相似。日本進入了江戶時代後，儒學之風甚盛，尤其是程朱理學，可以說是成了當時儒學界的主流。荻生徂徠就生活在這樣一個環境裡，他自幼就師從朱子學派的林春齋（168-1680年）與林鳳岡（1645-1732年）。荻生徂徠的青年時期所接觸到的大多是程朱所註之書，他的學習方法就是通過研讀書中的註解來理解文中之意，因而他前期的著作受程朱理學的影響可以說是很深，就此說他早年尊崇程朱理學也並不為過。而他周圍的飽學之士也都埋頭研讀程朱所註之書。有幸的是荻生徂徠還接觸到不少李攀龍與王世貞的著作，他在讀了李、王的著作後得到了啟發，發現了自己以前所讀的程朱的註釋竟有不少謬誤。而李、王的著作也並不好懂，須要讀懂古書後方能融會貫通，領略其中深意。這在他給《復安澹泊》（第三書）中說得很清楚：

中年得李于鱗王元美集以讀之，不可得而讀之。於是發憤以讀古書，其誓目不涉東漢以下，亦如于鱗氏之教者。蓋有年矣，始自六經，終於西漢，終而復始，循環無端，久而熟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其文意互相發，而不復須就注解。然後二家集，甘如噉蔗。於是回首以觀後儒之解，紕繆悉見。¹³

文中的安澹泊即安積澹泊，系朱子學派的儒學者。荻生徂徠在文中提到是中年才得到李攀龍與王世貞的著作，自那時起為了讀懂李、王之言，發憤讀東漢以前的古書，並說這都是“如于鱗氏之教”。在這裡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荻生徂徠通過讀李、王的文章，

¹³ 《復安澹泊》（第三書），《徂徠集》卷二十八。

接受了他們所提倡的復古文學主張，並付诸於實踐。因為“亦如于鱗氏之教者”，那是李攀龍認為“秦漢以後無文矣”，¹⁴所以荻生徂徠就只讀東漢以前的文章，而且是“終而復始，循環無端”。至於李、王的文集“不可得而讀之”，這也就是王世貞所說的“李于鱗文，無一語作漢以後，亦無一字不出漢以前”。¹⁵所以只有在讀懂了秦漢的古文之後，才能讀懂李、王的文章。

由於當時儒學界受程朱理學的影響甚大，荻生徂徠認為有提倡古文辭的必要，在《答屈景山》（第一書）中，他提出了古文辭學一辭，其中這樣寫道：

……二公發諸行文之際渙如也，不復須訓詁。蓋古文辭學，豈徒讀己邪，亦必求出諸其手指焉。能出諸其手指，而古書猶吾之口自出焉，夫然後直與古人相揖於一堂上，不用紹介焉。豈如鄉者徘徊乎門牆之外，仰人鼻息以進退者邪，豈不愉快哉。且二公之文主敘事，而于鱗則援古辭以證今事，故不諳明事制者，雖熟古書，亦不能讀焉。夫六經，皆事也，皆辭也，苟嫻辭與事，古今其如示諸掌乎。於是回首以讀後世之書，萬卷雖夥乎，如破竹然。譬諸良工，必先攻堅木焉，吾之刀試諸盤根錯節，而其餘脆材柔木易易耳。世人乃擇其易者讀之，習以為常，古書則束之高閣，譬諸古鼎彝之可貴重，而不可猥用也。……¹⁶

在這裡他不僅提出了古文辭學，還用了好多比喻來說明其重要性。文中對李、王的文章可以說是倍加讚賞，還提到了“二公之文主敘事”，而六經都是用辭敘事，“苟嫻辭與事”，則可通曉古今之書，此時再“回首以讀後世之書，萬卷雖夥乎，如破竹然”，強調了古文辭的重要性。文中還寫道：

明李、王二公，倡古文辭，亦取法於古。其謂之古文辭者，尚辭也，主敘事，不喜議論，亦矯宋弊也。夫後世文章之士，能卓然法古者，唯韓柳李、王四公。故不佞嘗作為《四大家集》，以誨門人。而其尤推李、王者，尚辭也。雖然，不佞所以推二公者，不特此耳。夫學問之道，本古焉，六經論語左國史漢，古書也，人孰不讀。然人苦其難通，古今言之殊也。故必須傳注以通之，猶之假僂訓以讀華文邪，尚隔一層髮髻已矣。且傳注之作，出於後世，古今言之殊，彼亦猶我也。彼且以理求諸心，而不求諸事與辭，故其紕繆。……¹⁷

在這裡可以明顯地看出荻生徂徠是在李、王的復古文學思想的影響下形成了自己的古文辭學的文學主張。其中古文辭的定義是“尚辭也，主敘事，不喜議論”，而宋儒所注之書多為議論，所以古文辭可以矯正這一弊病。其中的“傳注之作”也是指程朱所註之書，可見他對宋儒即程朱理學的批評是相當激烈的。其中還有值得引起注意的就是荻生徂徠

¹⁴ 李攀龍《答馮通府》，包敬第校《滄溟先生集》卷二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¹⁵ 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七，《歷代詩話續編》中冊。

¹⁶ 《答屈景山》（第一書），《徂徠集》卷二十七。

¹⁷ 《答屈景山》（第一書），《徂徠集》卷二十七。

提到當時的文人只能通過註解來讀六經、《論語》、《左傳》、《國語》、《史記》、《漢書》，以至於曲解了六經之意也渾然不知，所以提倡古文辭是非常有必要的。

他在《與戴震菴》（第一書）中寫道：

不佞始習程朱之學，而修歐蘇之辭，方其時，意亦謂先王孔子之道在是矣，是無它，習乎宋文故也。後有感於明人之言，而後知辭有古今焉。知辭有古今，而後取程朱書讀之，稍稍知其與先王孔子不合矣。夫然後取秦漢以上書，而求所謂古言者，以推諸六經焉。則六經之旨，瞭然如指諸掌矣。是亦無它，習乎古文故也。¹⁸

這封信是在荻生徂徠四十六歲的時候寫的，這裡只說了“有感於明人之言”，而沒有提到李、王二人，但從較早的其他書信中已對李、王極其推崇的表現來看，此處的明人應該就是指李、王。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他提到了自己是在對明人之言有所感悟後，才知道辭有古今之分。而“知辭有古今”後再讀程朱之書，就發現他們的註解有些與先王孔子不合。然後再讀漢以前的文章，等讀懂了“古言”，再回頭讀六經，就對六經之旨瞭如指掌了，而這一切都歸功於學了古文辭。

他在《與戴震菴》（第一書）中還寫道：

大氏世人，自幼讀程朱書，而習之所化，尊信程朱過於古聖人矣。且六經古言艱奧，難可通曉，故喜於程朱書之易讀。且其意謂程朱大儒也，其解六經，宜若無誤矣，故今人止以理之當否辯之，而不復問辭之合否。……¹⁹

荻生徂徠在這裡指出了當時的文人畏於六經深奧難懂，覺得程朱所註之書易讀，所以都讀程朱之書。且又尊崇程朱是大儒，對六經的解釋也絕無謬誤。而產生這種情況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們不知古文辭，這一點他在《答東玄意問》中說得很清楚，他說“後世學者不知古文辭，故不能讀六經，又不知中庸孟子主意，徒見其易讀，遂以為六經階梯”。²⁰這種以中庸孟子為六經階梯的學習方法，才導致了當時的文人只重理，而不重辭與事。

荻生徂徠提倡古文辭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當時的文人用和訓²¹來讀漢文，他認為這是一大弊病，因為用和訓來讀漢文，雖然能理解文章的意思，但卻不能看到文中的修辭之美。

他在《答屈景山》（第一書）中這樣說道：

……且古言簡而文，今言質而冗。雅言之於俚言也，華言之於倭言也，亦猶如

¹⁸ 《與戴震菴》（第一書），《徂徠集》卷二十三。

¹⁹ 《與戴震菴》（第一書），《徂徠集》卷二十三。

²⁰ 《答東玄意問》，《徂徠集》卷二十八。

²¹ 和訓一也稱“倭訓”，是一種讀漢文的方法，具體是在漢文上面注訓點，以日語的語法讀漢文，主要是領會其中的意思。

是歟。夫華言之可譯者其意耳，意之可言者理耳，其文采粲然者，不可得而譯矣。故宋文之與俚言倭言，其冗長脆弱之相肖。亦必從事古文辭，而後可醫倭人之疾，是來喻所云，適與不佞意同也。來喻又以二公為淺易，亦唯人心如面，非不佞所知也。不佞以為深，足下以為淺。其足下之以為深者，不佞則謂淺，豈不冰炭之相反乎，亦習異耳。……²²

這段話裡有好幾層意思，在這裡我們就取其“亦必從事古文辭，而後可醫倭人之疾”這一層，其中的“倭人之疾”是指“和訓”，用和訓來讀漢文，只能理解其中的意思，而不能看到文章的文采燦爛，即所謂的辭。而用和訓來寫文章也是如此，所以當時的文章大多偏重於理，空洞而沒有生氣。在荻生徂徠看來只有通過學習古文辭才能克服和訓所帶來的陋習。為此他提倡用華語寫華文，也就是用漢語寫漢文，同時他還提倡寫漢詩。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荻生徂徠對明代後七子文論中的復古文學主張是持全部接受的態度，具體表現在荻生徂徠對明代後七子的代表人物李、王的文章是極其推崇。在他看來，“後世文章之士，能卓然法古者，唯韓柳李王四公”，四人之中他又“尤推李、王”，同樣是古文運動的領袖，他卻認為明代的李攀龍、王世貞要高於唐代的韓愈、柳宗元，那是因為李、王“尚辭”，因此可以說荻生徂徠的古文辭學就是要在日本推行李、王的復古文學主張。而這也是針對當時在儒學界佔主導地位的朱子學派而言的，因為這一派文人只讀程朱註解之書，所以他們所學到的就是那些已被程朱篡改或是歪曲了本意的六經、《論語》、《左傳》等書的註解。還有就是當時的文人用和訓來讀漢文，只能領會意思，而不能領略其中的文采。當時的文人還都用和訓來寫文章，冗長疲弱，空洞無物。為了不讓這種文風持續下去，所以提倡古文辭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

我們將第一章與第二章相比較之後就可以明顯地看出荻生徂徠是在李、王的復古文學思想的影響下形成了自己的古文辭學的文學主張。因為他們所要反對的都是宋儒的理學，且兩者的周邊環境也十分相似，這就是荻生徂徠為何會全盤接受李、王的復古文學思想的主要原因。

毋庸置疑，通過提倡古文辭，文人們擺脫了程朱理學的束縛，不再讀傳註之作，而是直接研讀《論語》、《左傳》、《國語》、《史記》、《漢書》等先秦漢的文章。這些文人在讀懂了古文後，也能讀懂李、王的著作了，這在下文中可見一斑：

……李、王大才，其於古，未嘗屑屑乎做訓詁，而退省其文章，亦足以發也。故余特賞二公者，為其能梯航乎古也，不獨取其詞藻也。次公答東壁，辯駁甚至，予傍看大喜。亡論其言當不當，其能以此心讀二公集，二公之骨真不朽矣哉。……²³

²² 《答屈景山》（第一書），《徂徠集》卷二十七。

²³ 《與興次公》（第三書），《徂徠集》卷二十一。

此處的次公即山泉周南，是荻生徂徠的弟子，在這裡荻生徂徠稱讚李、王大才，表示了對李、王的敬意。同時對山泉周南也能讀李、王的文集而感到高興，言語之間充滿了讚許之意。可見古文辭學派所提倡的重修辭與敘事、不喜議論也因此而影響了文壇，文人們的文章作風開始改變，古文辭學派的興起確實起到了矯革時弊的作用。

當然也因為全面地接受了李、王的復古文學主張，而給古文辭學這一流派的發展帶來了一定的局限性。其主要表現為對宋文及宋以後文的否定，荻生徂徠在讀了李、王的文集後，就“日不涉宋後者”，並對自己早年學歐蘇的文章作風也表示了反省。在《徂翁雜抄》中，有荻生徂徠讀李攀龍文集時所作的筆記，其中這樣寫道：

“二三君子”豈兼指茅鹿門輩邪，“治牘成一說”指制義，“俚言而布在方策”指宋儒語錄近思錄類。²⁴

這段話的出處在李攀龍的《送王元美序》中，“今之文章，如晉江、毘陵二三君子，豈不亦家傳戶誦？而持論太過，動傷氣格，憚於修辭，理勝相掩”。“世之儒者，苟治牘成一說，不憚儕俗，比之俚言，而布在方策者耳”。從筆記中可見荻生徂徠對宋文的看法與李攀龍是一致，同樣他對王慎中、唐順之也是排斥的。不僅是王、唐，他對唐宋派的王遵巖、歸震川的文章作風也頗為不滿，他在《護園隨筆》中這樣寫道：

仁齋所稱述王遵巖、歸震川皆小家數，何足數哉。況此方學者，率鮮有深遠含蓄之思，盛大雄偉之氣象，故其文皆冗長疎弱是為通弊。若以歐曾諸家為準，避則癢薪救火，愈見其甚已。²⁵

此處的仁齋即伊藤仁齋，是古學派的代表，他所推崇的是王遵巖、歸震川，二人的文章作法學歐曾。荻生徂徠在這裡批評了這種文章作風，指出“其文皆冗長疎弱”，而這也是伊藤仁齋及當時朱子學派文人作文的通病。

荻生徂徠的這種對宋文及宋以後文的全面否定，使得古文辭學派的文人在學習漢文學時的視野變得狹窄。實際上這段時期還是有不少文章是有著可取之處的，包括上述提到的歐蘇、曾鞏及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順之、王遵巖、歸震川也都寫過一些好的文章。

再有就是荻生徂徠對李攀龍的詩文可謂是情有獨鍾，他編纂了文集《四大家雋》和《古文矩》，作為入門弟子的教科書，《四大家雋》即為《四家雋》，其中選了韓愈、柳宗元、李攀龍、王世貞四人的文章，而《古文矩》則只選了李攀龍一人的文章。在《古文矩序》中有：“吾黨之士欲學古文辭者當先讀《四家雋》，欲通《四家雋》者，當先讀此書”。從中可見他對李攀龍文章的態度。李攀龍的文章難懂是眾所周知的，這樣就給弟子們在學習上增加了不少難度，或多或少地阻礙了古文辭學派的發展。

²⁴ 《徂翁雜抄》見《服部文庫所藏本》。

²⁵ 《荻生徂徠全集》，みすず書房。

結語

綜上所述，通過比較我們可以看到荻生徂徠提出古文辭學的文學主張時的周邊環境與李、王倡導復古時的極為相似。前者是以朱子學派為首的程朱理學佔據了江戶儒學的文壇，文人只讀程朱註解之書，所以他們所學到的都是已被宋儒篡改或是歪曲了本意的六經的註解。後者則是擔憂“今之文章”的文章作風受王慎中、唐順之的影響，重“理”而輕“辭”，轉向宋儒之學。兩者所要反對的都是宋儒理學，這就是他們之間的內在聯繫，也是荻生徂徠為何會全盤接受李、王的復古文學思想的主要原因。

荻生徂徠是在李、王的復古文學思想的影響下形成了自己的古文辭學的文學主張，何謂古文辭，即“尚辭也，主敘事，不喜議論”，也就是明代後七子文論的核心，即重“辭與事”的文章作風。他所倡導的古文辭學矯革了文人只讀程朱註解之書這一時弊。荻生徂徠倡導古文辭學的意義還不僅限於此，當時文人用和訓讀漢文，只求會其意，而無視修辭；用和訓寫的文章空洞乏味、冗長疲弱。古文辭學則是醫治和訓的一劑良藥，在習得古文辭後，就能用漢語寫漢文，也能寫漢詩，使江戶時期漢詩文的創作又得以重現繁榮。